

董时进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探究

吴 强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 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长期任教于国内各大高校农学院,不仅从事有关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还曾出掌国立北平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两校的农学院院长一职,对于如何办好高等农业教育有其一整套独到见解。此后,他还担任过江西农业学院院长,创办《现代农民》月刊,可谓既有深厚的学理积累,也因多年从事农业推广,深入农村而能沟通理论与实际,尤为强调农业院校应与田间地头对接,培养学生从社会整体视角观照和理解中国农业问题,而非局限于农业一隅。

关键词: 董时进; 农业; 高等农业教育思想; 教学做三结合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7)01-0014-04

作为“中国三农第一人”^[1]和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笔下“被遗忘的知识分子”^[2],董时进这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已为历史所湮没的20世纪前半叶中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三农”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先知”^[3]式学者近年来逐渐跃入公众视线,开始受到关注,其人其事、其文其说也已开始被时人谈论和研究。了解者或读者无不为他思考问题时的清醒、冷静和那些事后证明正确,而在当时却不为人理解的真知灼见所肃然起敬。董时进曾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平大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教授、农经系主任、代理院长(1931年10-12月)和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川大农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前身)院长,两校执教多年的经历更使这些内容分量倍增,对于省思当下农业教育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以造就人才为根本宗旨

董时进于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在他看来,农业要发展,应以高水平农业教育为基础,从而造就符合中国农业所需的大批人才,这是农业教育的根本宗旨。

(一) 正确认识农业教育

对于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和现代美国大学农学训练的董时进来说,农业教育不单是传递一门手艺,“而应该有启发思想,发展人格的作用,我们虽不可藐视技艺,然而专门传授技艺,只能算带学徒,不能算教育”^[4]。针对时人多奉“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条,但并未立足于农业自身特点而做深入思考的流弊,董时进提出中国

农业教育急需的并不是这种“官样文章”式高标,“乃是事实上的宗旨,即受过高等教育之人,究应具有何种学识本领,能在社会任何种事体?故定事实的宗旨,不可一味摹仿外洋,须细审本国国情,察其需要,又宜枚举条陈,不可概括笼统”^[5]。简言之,来自农村的董时进非常注重从实际需要和中国自身实情出发,毕竟,各国农业所处外在客观环境和条件差异甚大,难以类似工业进行大规模统一化生产。农业教育也要有一定的分工,各省农校就不必求大求全,而应以地方性为主,因地制宜,避免千篇一律,而在北京、南京等地则应建立几所全国性农科大学,以研究和解决那些关系到全国的农业基本问题,同时也为其他农校提供师资进修之所,以此连成一体,形成良性分工循环。

(二) 培养什么样的人

多数人认为农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应直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才算得上学以致用,而董时进认为,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层面,农科学生即使在其他领域亦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不一定非得亲耕垄亩方能用其所学,因为农业的牵涉面极为广泛,农业生产仅为其一,另有其他多方事务需要诸种人才,以解决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各环节问题。

董时进将造就以下四个方面的人才视为农业教育的重中之重:一是为农业学术人才,其中又可细分为农业技术人才(如农场、试验场中的技工和研究人员)、农业教育人才(此处主要指农业学校中包含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在内的教职员)两类;二是农民领袖人才(如各级农会会长和各种农民团体之首领);三是为农业行政人才(如中央农商部、各省农业厅中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中的县知事);四是农业经营人才(如垦荒、畜牧和普通农场的经营者)。从中可见,董时

收稿日期:2016-11-28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2015年度课题“习近平‘三农’思想研究”(编号:201501)。

作者简介:吴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农史和“三农”问题研究。

进对农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计划设想周密、全面,显然是将其置于“大农业”的整体构架下来考量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董时进明确将对农民领袖人才的培养单列,表明他充分意识到农村缺乏领导,农民各自为战,需要有能力强的人将他们组织起来,代表其发声,并逐步训练广大农民的团结意识和协作精神。更具特点的还在于董时进强调应由学农者担任县长,其理据主要是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产业,农民又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一县之长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发展实业和教育,而二者的重点都在农业和农民,只要能把二者处理好,一县之政务即去其半。

(三) 改革课程和科目设置

要造就符合需要的人才,农业学校中的课程和科目设置自然也就需要随之改革,务必做到与之配套。

近代中国的农业教育源于19世纪末,实乃西学东传之产物。历经清末民初,时至1927年,全国高等农科和农业专门学校共计22所,其中的本科14所^[6]。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农业教育仍然存在学生所学科目有限、专门,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知识较为匮乏的问题,遂也导致不少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纸上谈兵,不切实际,难以应付较为复杂的农政事务。对此,董时进呼吁农业学校应改旧制为选科制,最大限度地给予学生以学习的自由和空间,并在农科课程之外逐步开设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历史等相关课程,供学生选修,以拓宽他们的视野,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董时进彼时就先见之明地指出农科大学专业过于单一,“单科大学之弊,即在其不能使学子见闻宏博,养成宽大的态度”,“实科学生,缺乏文理的修养,遂不免成为机械。调剂之道,在使学子于本行之外,至少须具有他科之重要常识”^{[5]12}。故农科大学在主科之外应渐渐向多科性大学发展,或与综合性大学合作,作为其附设之农学院,如确实无法合作,也应增加科目,扩充课程,使其完备,否则将极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也会使自身发展受限。

二、教学做三结合

(一) 兼采中西,扎根本土

作为现代西方学术之一的科学农学在中国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7]的艰难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倾力于编写切合中国农业实际的大学教科书”^[8],即用中国人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来转述农学之理,并辅以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经验来进行综合诠释。与之相似,西方经济学的东来亦是移植性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特别是留学生前往欧美学习返国后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中介”和“先锋”^[9]作用,并逐渐取代此前的传教士,成为传播、译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力。

这一时期已经在大学任教的董时进深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国民众的基本物质需要和国家、社会

的命脉。如他所言,“农业是有永久性的,无论在任何时代,农业都占着重要的地位”^[10]。“中国农业,因其经济上之重要,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秩序,亦有至大之关系,欲救济中国之不安,亦非谋农业之振兴,使农民之经济及生活得舒解,而能自安其业不可也”^[11]。其经济问题毫无疑问也就需要对此专门研究,以供各界斟酌参考。

正因为有此急需,专攻农业经济学的董时进迫切感到必须改变农业教育脱离中国实际的尴尬境地,逐步减少教员多为外聘,教材直接采自西方原著的状况,渐次使用本国术有专长者,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教科书,这也就是当时在中国学界已成为共识的“科学的国话化”和“科学教科书的国话化”。学者和教师的使命在于将西方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陆续开展有关中国农业史及其理论的研究,最终实现农业教育的本土化,而非亦步亦趋,尾随于后,仅靠翻译西方教材。

为了更好地传达这一理念,董时进本人还撰写并出版《农业经济学》一书,将西方学理与中国农业相结合,而除此书之外的《国防与农业》《食料与人口》《中国农业政策》《农村合作》等多部专著也都蕴含他立足中国、兼采中西的研究原则。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四年级所开设的农业经济学一课被分作“农业经济学之重要原理”和“中国农业及农民之经济问题”^[12]两个部分也能说明这一点。

(二) 农经与农技相结合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将农业经济学界定为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所有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农场经济、农业部门、农业体制),二是对农业部门特征的经济分析^[13]。就学科属性而言,农业经济学横跨农学和经济学,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而与一般经济学(或曰理论经济学)相对。与欧美不同,就中国而言,由于农业在当时所占份额及其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业经济。

农业是一项实业,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生产、丰收,更主要的还在于通过它获利,收到实际效果。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就需要特别注重利益与损失的关系,明确生产的数量多寡与利益大小并非等同,需要区别对待,不能混淆。“农业发达,不是讲农民数目的多,也不是论农田面积的大,是要农产物——原料或食品有余无不足”^[14]。“所谓科学的农业者,即农业之经营,须合乎科学之法”^[15]。董时进进一步解释道,农业包含技术和经济两个层面,前者追求产量的提高,而后者则是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而农业经济又可分为两支:一是个人,曰农业经营,以个人利益为主;二是社会或国家,曰农业经济或农政,侧重于如何增加社会或国家的利益,使其充分发达。农业经济包含很多细目,如土地经济、土地分配问题、土地整理、土地改良和租佃关系等。

总之,董时进指出农经与农技不但相互关联,而且不可分离,相互依托。农经专业学生必须先过农业技术这一关,

学习农业经济,就要具备农业的基本知识,如土壤、肥料、作物、畜牧、园艺和病虫害等,学好之后方可用于对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不着边际。在他担任平大农学院院长期间,农经系低年级学生就与其他专业一同上课,以学习农学相关课程为主,待到高年级后再辅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学习。

(三) 落实学生的实习与训练

“农业本为一种应用科学。理论与实习。应双方并重。夫所谓实习者。非仅每星期数小时农场实习而已。凡各种农业功课,如土壤、病理、昆虫、肥料等类,均应有实验”^[16]。不难理解,有别于人文社会科学,农科学习除了基础理论之外,学生的课外实习和田间训练就显得至关重要。一旦欠缺这两者,也就不可能指望学生在生产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针对当时国内农业院校所存在的课程普通、实习时间少、农科学生视野较之其他专业狭窄等诸多共通性问题,董时进在任职平大农学院和川大农学院期间,一直谋求将调查研究、科学试验和学术交流有机结合,尤其强调学生理论学习之外实习与训练的重要性。农业学校必须同时具备田产和试验场,以供教师和学生课余实践所用。为了改变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实习无目的,只为敷衍点卯,没有实际内容,好比上衙门”等问题,董时进直言应干脆取消。

三、办学应直接面向农村和农民

(一) 拆除“围墙”与农民融为一体

中国古代虽早就有农业教育,但更多的是经验性积累,并未走上以农业科学为基础,依托于中高等农业学校的发展路径。更何况当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皆以科举功名为正途,“传统儒生对于有关实业的、治生的、劳力的教育,大都采取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其地位远不如普通教育之高”^[17]。“要读书的人耕田,比要耕田的人读书尤其困难。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读书人,轻视庄稼汉,读书人又闲逸,又高贵,耕田的又劳苦,又贫贱”^[18]。

对此,董时进提出农业学校应拆除“围墙”,走入乡间,切勿故步自封,农科学生也应与农民融为一体,以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19]。在任职平大农学院院长期间,他将平大农学院所在地罗道庄附近的村庄联合起来,作为农村实验区,并抽调农经系高年级学生参与建设工作,下分总务、设计和业务等三组,均由实习的三年级学生担纲。实验区内办有托儿所、诊疗所、博物馆等设施,为农民提供相应服务,同时亦有农村青年训练班,以夜校补习形式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农事技能。

(二) 重视农推,以农民需求为准

董时进也对农业推广工作甚为重视,但他的理解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农业推广’实际并非农业推广,乃是农业教

育推广,或农业推广教育,因为我们不是要推广农业,乃是要推广农业教育,不是要中国人个个都去务农,乃是要现在务农或想务农的人,得到农业的和关于农家买卖及生活的新知识”^[20]。也就是说,农业推广目的在于改良农业和改进乡村生活,不单为农民所办,也是为国家和全体人民所服务。

这就涉及对农民实际需求的准确判断,如果农业推广的内容不符合农民需求,势必导致浪费资源。董时进深感“农民所最感困难,而又最无办法的,到底还是一个穷字,这一个字不解决,就教他们识几个字,给他们一点公民或生活常识,他们拿去,也没有多大用处。从事乡村工作,若单讲普通的组织训练,而不能在农民的职业上有帮助,使他们得到物质上的利益,久了便会感觉空虚,甚至于使农民失望,或增加他们的烦恼”^[21]。进而需教他们知农,“我们很可以用农业上的现象和问题来教育乡下人,不但使他们知道他们一天所干的是什么,并且可以借此教他们数学、理学、经济学和各种科学的知识。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脑筋,开通他们的思想,增加他们解决问题,辨别事理的能力。这些事真正的教育,特别是农民所需要的教育”^[22]¹⁸。

最根本之处在于董时进对农民自身选择的尊重和理解,而未以居高临下之态训育民众,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敢说农法一定很好,但是我敢说,就他们所有的资源和环境讲(土地资本、地方状况等),总算作得不坏,恐怕教任何国家的农民,处到同样的境地,也未必能多超过他们的生产”^[22]¹⁷。

四、意义与启示

“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提出新见解,首先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旧传统的束缚的,总是个别人;能够迅速认同新见解的也往往只能是少数人,而多数人往往一时难以接受对他们完全陌生的新思想”^[23]。持平而论,这段话用来形容董时进的一生遭遇可谓恰如其分!然而,梳理董时进的农业教育思想却也启发良多,下述两点尤为值得一提:一是到底谁最懂得农民?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只有农民自己最了解,而他人(尤其是精英阶层)最常犯,也最应避免的恰恰是以己之意代农民着想。董时进说得很好,“那些没有知识,靠天吃饭、墨守旧法的农民,所用的一些器具及方法,在他们的环境和各种条件限制之下,恐怕是最适合的、最经济的,也是最难改变的。世间事物,都有整套性,必须能配合”^[24]²³⁵。揆诸历史和当下,他的这番话显然是站在时代前列,可谓一语中的。二是农业教育旨在培养人才,服务中国农业,这也就必然要求农业学校的办学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农业赖以发展的客观历史环境,并指导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综合考察,切忌将中国农业问题“技术化”,更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农业道路。最后还是以董时进的箴言为全文作结:“中国的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的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

土地和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24]²³⁵

参考文献:

- [1]王秀清,谭向勇.百年农经(1905-2005)[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08.
- [2]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357.
- [3]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J].二十一世纪,2010(6):104.
- [4]董时进.农业教育之真义[J].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2(5):73.
- [5]董时进.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几个根本问题[J].中华农学会报,1926(51).
- [6]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55.
- [7]曹幸穗.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J].古今农业,2004(1):45.
- [8]邹进泰,张爱虎.激荡百年:大国农业(1912-2012)[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3.
- [9]邹进文,黄爱兰.移植与创新:中国近代经济学百年变迁鸟瞰[J].江汉论坛,2013(6):54.
- [10]董时进.改进中国农业之实际问题[J].民间,1937(5):1.
- [11]董时进.农业经济学[M].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3:57.
- [12]孙家红.通往经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3.
- [13][法]克洛德·热叙阿,等.农业经济学[M].李玉平,郭庆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 [14]董时进.理想的东亚大农国[J].东方杂志,1927(11):2.
- [15]董时进.科学的农业与中国之改造[J].科学,1924(7):738.
- [16]华恕.邹秉文纪念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13.
- [17]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71.
- [18]董时进.如何打通农学生的出路[J].江西农讯,1935(13):247.
- [19]董时进.乡居杂记(一)[J].独立评论,1932(28):10.
- [20]董时进.农业推广教育的几个根本问题[J].农村月刊,1930(10):26.
- [21]董时进.两件重要乡村工作[J].江西农讯,1935(22):412.
- [22]董时进.乡下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J].独立评论,1933(47):22.
- [23]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2.
- [24]董时进.两户人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235.

The Study of DONG Shi – jin’ s Thoughts on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WU Qiang

(College of Marxism ,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Taigu 030801 , China)

Abstract: As a renowned agricultural economist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 DONG Shi – Jin taught at the Agronomy college in major domestic universities long time , which not only engaged in teaching work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and was also head the two colleges of Agronomy in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ichuan University long post , has its set of insights to how to Run agricultural education. Since then , he has also served as Jiangxi Agricultural Academy , establish the magazine of “modern farmers” , can be described a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and communica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ecause for many year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at agricultural colleges docking with the fields , students contemplated and understood chinese agriculture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social , rather than confined to a corner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DONG Shi – jin; agricultural;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thoughts;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 learning and doing

[责任编辑: 郝文斌]